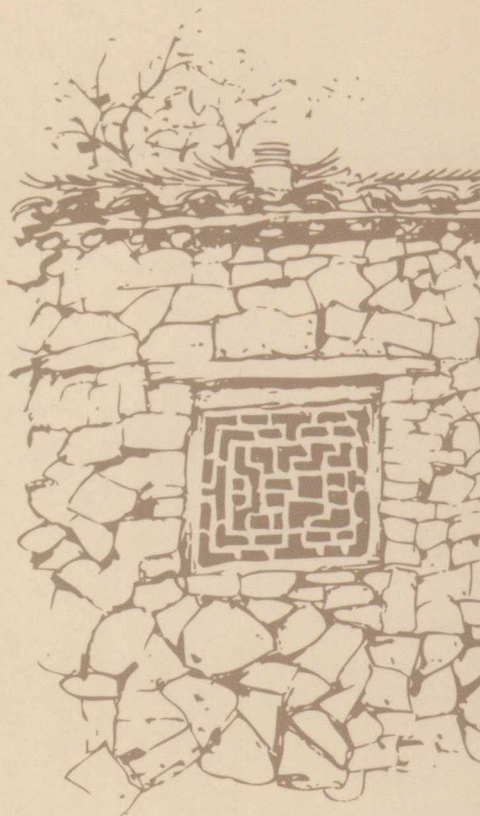


脆弱性贫困

问题反思、测度与拓展

郭劲光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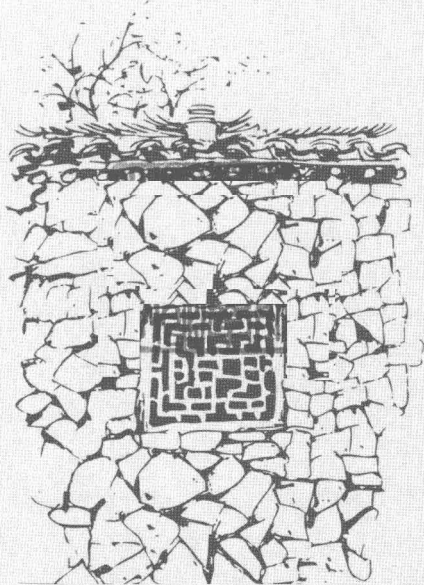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脆弱性贫困

问题反思、测度与拓展

郭劲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脆弱性贫困：问题反思、测度与拓展/郭劲光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6

ISBN 978-7-5004-9820-9

I. ①脆… II. ①郭… III. ①贫困—问题—研究—中国
IV. ①F1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84926 号

责任编辑 胡 兰
责任校对 王俊超
封面设计 大鹏设计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8.625	插 页	2
字 数	225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I 理论基础篇

第一章 “解释—测度—行动”架构下的贫困研究梳理·····	(3)
第一节 解释层面的贫困研究·····	(5)
第二节 行动(扶贫)层面的贫困研究 ·····	(10)
第三节 贫困测度的现状与不足 ·····	(12)
第二章 脆弱性的理论解读与测度 ·····	(14)
第一节 脆弱性的来源与不同定义 ·····	(14)
第二节 自然系统的脆弱性与人文系统的脆弱性 ·····	(17)
第三节 贫困与脆弱性的内在联系:PPE 怪圈 ·····	(19)
第四节 脆弱性贫困的经典识别架构与度量实践 ·····	(22)
第三章 基于脆弱性减贫的 PAR 架构与指标体系·····	(39)
第一节 贫困内涵的逻辑演进与脆弱性视角 ·····	(39)
第二节 PAR 模型的提出与指标选择 ·····	(48)
第四章 贫困动态的理论考量 ·····	(58)

II 实践度量篇

第五章 中国扶贫治理实践的现状与问题反思 (69)

第一节 基于“战略—组织—资金”三维视角的 问题反思 (69)

第二节 基于社会公正视角的问题反思 (76)

第六章 贫困县脆弱性贫困综合调查与数据测度 (90)

第一节 贫困县样本调查与描述性统计的初步分析 (90)

第二节 聚类分析 (101)

第三节 脆弱度分析 (104)

第四节 敏感度分析 (107)

第七章 样本贫困县的贫困动态度量与发现 (111)

第一节 脆弱性贫困动态的测度构想与测度 (111)

第二节 样本脆弱性贫困动态的结果与建议 (114)

附录 连续贫困 t 年后不再贫困和只返贫一次的 可能情形 (128)

III 应用拓展篇

第八章 粮食价格波动与贫困人口福利的影响测度 (139)

第一节 粮食价格波动及其成因分析 (140)

第二节 人口消费结构、粮食消费及其福利影响的 差异化 (143)

第三节 消费价格、粮食价格波动与福利影响 (150)

第四节 粮价波动对低收入人口收入变动与贫困 发生率的影响 (156)

第五节 小结·····	(161)
第九章 基础设施减贫效果的实证评价·····	(163)
第一节 基础设施减贫间接模式:基于经济增长的 视角·····	(164)
第二节 农业增长的直接减贫效果·····	(169)
第三节 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效应检验·····	(172)
第四节 基础设施减贫的直接评价:指标设计与 实证检验·····	(176)
 IV 政策视角篇	
第十章 救济政策制定的时序结构与制度安排·····	(213)
第一节 脆弱性扶贫干预总体架构·····	(213)
第二节 扶贫救济时序结构与制度安排·····	(217)
 第十一章 生态工农业发展框架下的基础设施减贫 政策安排·····	 (227)
第一节 基础设施供给的生态可持续发展扶贫架构·····	(227)
第二节 中国生态工农业基础设施需求状况分析·····	(232)
第三节 基于参与式扶贫项目的基础设施供给·····	(235)
第四节 基于不同生态农业模式提供基础设施·····	(238)
第五节 政府在平衡生态工农业基础设施供求 关系中的定位·····	(245)
第六节 其他·····	(250)
 参考文献·····	 (253)

I 理论基础篇

第一章

“解释—测度—行动”架构下的 贫困研究梳理

贫困是复杂的社会建构，任何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为此付出了惊人的代价。有关政府贫困救助的正式记载可以追溯到1601年英国的贫困救济法，但相信贫困救助的实践要远早于此。随着时间的推进，社会救助政策可谓推陈出新，但至今仍然无法彻底根治贫困。近些年，随着贫困问题被探索及贫困度量标准的讨论，贫困并非仅是停留在一个时间点上的表态现象的观点日益被越来越多的研究学者所认同。相应的，贫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自从1984年中国提出反贫困战略以来，扶贫干预措施及其活动越来越精细化，扶贫的力度也在加大。反贫困的主流模式到今天已经改变了数次：由最初的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转变成了今天的扶贫到户和以人为中心的扶贫。国家也从自上而下的介入式扶贫为主，变成多元主体的参与式扶贫为主的模式。尤其是近几年来，国家将三农问题作为社会经济发展工作的重中之重，将新农村建设摆在了“十一五”规划的首位，这无疑为解决广大农村、农民的贫困问题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纵观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贫困与反贫困斗争轨迹的跌宕起伏，这期间可谓喜忧参半。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例，国家近

些年来对农村的“六小工程”^①投资每年在不断增长,同时带动了地方各级政府、农民和社会资金的投入,使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和增长速度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据统计数字显示,21世纪最初的两三年较之20世纪90年代末,农民在粮食生产以及收入上都实现了重大的转机。在农民收入方面,2004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936元,比2003年增加314元,增长12%,扣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实际增长6.8%,创1997年以来的最高增速;在粮食生产方面,2004年粮食总产量达到46947万吨,据最新的国家统计局公报显示,2005年的粮食产量达48401万吨,增产3.1%。然而,随之而来的对中国农村的贫困水平的统计数字却引起了各界的一片哗然,贫困问题不仅没有得到好转;相反,返贫问题却日益浮出水面。根据国家统计局2004年的统计数字显示,2004年末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2610万人,比2003年减少290万人,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为2.8%,比2003年下降0.3个百分点。但国务院扶贫办称:中国绝对贫困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而据农村住户调查资料测算,农村贫困人口返贫率竟然高达30%左右。重庆市涪陵区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对农村居民返贫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调查结果显示,2001年和2003年,涪陵区农村居民返贫户为4364户、11426人,分别占全区农户及农业人口的1.72%和1.38%。可见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农村的贫困问题依旧是当前不可避免的一个现实问题,即使是江苏、浙江等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的农村,也存

^① “六小工程”指节水灌溉、人畜饮水、乡村道路、农村沼气、农村水电、草场围栏等工程。近年来,中国在这些工程上的投资支持力度逐年扩大:2001年为101亿元,2002年为136亿元,2003年增加到280亿元。

在着不少贫困农民，而且，贫困的差距日益扩大、复杂程度也在增加。农村能否脱贫致富不仅关系到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也关系到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下去，还关系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和地位。那么，经济绩效提高的同时为什么没有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呢？贫困到底该如何解决？在此，笔者试图提出贫困的脆弱性视角对此予以作答。

现有的贫困研究都是围绕着三个主题来进行的，即如何认识贫困、如何度量贫困以及如何采取具体的行动来缓解和消除贫困。

第一节 解释层面的贫困研究

贫困是一种复杂的生涯状态的建构。在贫困建构中体现了多重权力、利益和文化关系的相互介入、对话、斗争和适应。其中有全球性的发展工业话语及其系统的进入，有特定地区或国家的行动者为政治/经济利益而做出的回应和相应的对属地内某些居民的状态定义、分类、确认与解释，也有特定的地方性与特定个人为了生存而作的选择和接受。长期以来，学者们对于贫困的解释主要分为贫困的文化论、贫困的功能以及贫困的结构论三大理论视角。

农村脆弱性贫困群体与以现代化为标志的文化生活相去甚远，思想文化上的弱势已经成为农村脆弱群体的最大缺陷，成为他们摆脱贫困的最大的障碍。同时，也是他们与其他群体相比具有的典型特征。在贫困的经济生活和落后的教育水平下，农村贫困群体的文化生活必然是贫瘠的。贫困的文化论观点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许多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像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的《贫困文化：墨西哥五个家庭实录》、爱德

华·C. 班菲尔德 (Edward C. Banfield) 的《一个落后社会的伦理基础》, 以及迈克尔·哈瑞顿 (Michael Harrington) 的《另类美国》等脍炙人口的著作。这种观点认为, 贫困是一种自我维持的文化体系。刘易斯曾指出, “贫困文化”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模型的标签, 是一个拥有自己的结构与理性的社会亚文化。它表达着“在既定的历史和社会的脉络中, 穷人所共享的有别于主流文化的一种生活方式”, 也表达着“在阶层化、高度个人化的社会里, 穷人对其边缘地位的适应或反应” (1968)。刘易斯在他的著作中曾谈道: “棚户区的孩子, 到 6—7 岁时, 通常已经吸收了贫困亚文化的基本态度和价值观念。因此, 他们在心理上, 不准备接受那些可能改变他们生活的种种变迁的条件或改善的机会。”与刘易斯一样, 班菲尔德也相信, “穷人基本上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利用机会摆脱贫困之命运, 因为他们早已内化了那些与大社会格格不入的一整套价值观念。改变贫困的可能, 只取决于外群体的力量”^①。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亚文化, 贫困文化是拥有自己的结构与理性的。它表达着在既定的历史和社会的脉络中, 穷人所共享的有别于主流文化的一种生活方式。也表达着在阶层化、高度个人化的社会里, 穷人对其边缘地位的适应或反应。贫困亚文化的存在, 一方面是穷人在社会强加的价值规范下无法获得成功, 而采取的种种应对挫折和失望的不得已选择。另一方面, 也有相当一部分的穷人, 他们完全心甘情愿地生活于自己的文化圈之中。

布尔迪厄 (P. Bourdieu) 在《世界的贫困》一书中认为, 穷人的窘迫往往源于他们没有选择, 而没有选择的主要原因之一

^① E. C. Banfield, *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58, p. 127.

是穷人在市场竞争中缺乏必要的文化资本^①。作为制度化形式的文化资本，明显具有代际传递特征。那么对于穷人来说，原本贫缺文化教育的穷人，其孩子的受教育程度亦将是低下的。教育程度相对低迷的历史，使他们积淀或内化了的适应主流社会的才能也相当贫瘠，或其内化的禀性迥异于社会主流文化，因而他们的生存心态、他们所能建构或鉴赏的文化财产都绝非是主流社会能够认同和接受的。穷人在文化资本上是匮乏而不入主流的，他们贫困因为他们自己别无选择。沿着这样的思路可以将贫困的根源还原为贫困者个体，主张“穷人对自己的贫穷负责”。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经济学家萨伊提出的著名的“萨伊定律（供给创造需求）”、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当中也都支持这样的观点。它延伸出来的含义则是反贫困是穷人的私事，与社会无关，与政府无关。在中国，文化主义贫困观也一直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勤劳自立，“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李强2003年主持的一次全国范围的抽样调查也表明，69.1%的被调查者认为贫困是穷人自己造成的，22.4%的人认为贫困是社会原因造成的（李强，1997）。

可见，正如学者周怡（2002）所讲的，当结构因素（经济的、政治的、自然的、社会的）造就出既定的贫困之后，我们需要倚重文化解释，尤其对较长时期的贫困现象就更应如此。理由是，每一种由结构使然的社会现象，包括贫困现象，都必然打上文化的烙印。反过来说，以文化支配力去度量贫困的结构逻辑，同样不失为一种研究和解释贫困的恰当的研究方法。

功能主义贫困观的基本视角是，贫困乃社会功能之需要。社

① 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既指由人们长期内化的禀性和才能构成的生存心态、也指由合法化的制度所确认的各种学衔、学位，还指那些已经物化的文化财产。

会不平等是由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和功能需要共同决定的。这种理论首先假定社会中各种职位在实现社会价值目标中的重要性程度是不同的,同时假定个人的天赋和努力程度也不同。社会为了有效地达到其主要的价值目标,就需要一些天赋优秀的人去担当较为重要的角色。为了吸引天赋高者去占领这些更重要的社会位置,并使其充分发挥才能,就必须赋予这些位置较高的报酬。同样,那些对实现社会主导价值目标的重要性程度不高的职位,社会所提供的报酬就较低。功能主义者还估价了贫困所具备的社会正功能,即对社会整体的运行和发展起到某种积极作用。譬如,穷人可以去承担社会中较为低下、肮脏的工作;穷人为劳动市场提供廉价的劳动力,也间接促进了职业者的劳动积极性;穷人的消费,延长了一些商品的经济使用寿命;穷人可以成为社会变迁和经济增长的代价,等等 [甘斯 (Gans), 1979]。当然,就功能论而言,贫困的负功能观点也是非常明显的,如马克思主义的冲突论观点指出,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工人除了出卖劳力,一无所有。这就形成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形成了支配和被支配、压迫和被压迫的生产关系。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资料所有者能够通过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使工人贫困化。随着资本的增长,工人阶级的贫困会进一步加剧,正如马克思(1972)所说:资本增长得愈迅速,工人阶级的就业手段即生活资料就相对地缩减得愈厉害。

持贫困结构论观点的学者视贫困为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结果,认为只要原有的结构、制度不改变,贫困就将持续存在下去。这种观点具体又可分为“劳动力市场二元论”、“福利制度贫困论”和“制度论”三种主要观点。劳动力市场二元论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存在两种劳动市场,一种是收入高的劳动力市场,另一种是收入低的劳动力市场,贫困与富裕则据此产生,这种分割的

市场结构是由教育、家庭背景、性别、出身、个人经历以及法律等多种条件决定的。福利制度贫困论则认为，现代社会都有一定的社会福利、保障或救济制度，其功能在于维系社会的安定，防止因一部分人陷入绝境而带来社会动荡。但国外许多社会学家的研究发现，西方国家实行了多年的福利制度不仅没有消除贫困现象，有时却由于它的存在使一部分人的贫困有所加剧。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政府的福利投资是有限的，对贫困只能起到缓解作用；二是福利救济的存在减弱了贫困人口劳动的积极性，产生了对制度的过度依赖；三是福利制度弱化了社会中最基本的经济单位——家庭，这种制度使家庭户主的竞争能力退化，因此会阻碍经济进步。制度论将贫困归结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制度，任何社会都会有贫富差别，一定的制度决定了谁是穷人，谁是富人。比如健康保健制度，不同阶层的健康状况由于保健制度的障碍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穷人的健康状况比其他任何人都差。

以上三种观点对贫困的解释各有侧重，总体来讲，它们都是悲观地看待问题，明确地说，无论是文化观点、功能观点还是结构观点所归结的诸因素都会引起和制造贫困，而且因素的调整不能真正解救贫困。另外，每一种解释往往仅注意致贫因子对发展的某一方面的限制，注意到引起贫困的某方面原因，而忽视致贫因子具有联系的方方面面，没能对贫困的实质给出清醒的认识。因此，每一个理论、每一个在理论之上建立起来的具体脱贫的举措，都经常是一种短期的权宜之计。笔者认为，关于农村的贫困问题，不能以单向思维的方式来看待。农村贫困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其变数是受各种因素的制约，贫困人口经过自己各种努力从贫困走向温饱，也可能一遇灾害又从温饱返回贫困。本书的基本观点认为，贫困的根源恰恰来源于贫困主体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笔者认为它将更具理论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

第二节 行动(扶贫)层面的贫困研究

由于对于贫困的不同理解、关注不同的致贫原因以及可资利用的扶贫资源的差异,各国、各地区有着不同的扶贫、反贫模式,总的来说可以分为社会福利模式、人力资本模式、需求满足模式以及发展极模式四类。

社会福利模式主要采取提供广泛的社会保障来解决贫困问题,这种扶贫行动对于缩小各阶层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和缓解贫困的作用都非常明显。目前,社会保障收入是各发达国家工作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占到30%。这种模式催生了一系列比较完善的公共福利设施,增加了第三产业的就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失业的压力。然而,社会福利模式存在明显的不足:一是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计划的管理中容易产生腐败现象,导致福利基金的不公平分配;二是造成受益者的依赖行为而导致社会效率低下;三是这种模式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保障,局限性很明显。

人力资本投资模式认为,在宏观层面上,一个国家人力资源的低质量会导致较低的人均国民收入;在微观层面上,贫困人口因综合素质较低,在经济机会竞争中必然处于劣势,从而加剧个体的贫困。所以必须进行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来长远地消除贫困。实行这种模式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地区。比如韩国,实行6年义务教育,基本普及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的注册数是89%。通过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韩国在1965—1982年的贫困发生率从40.9%下降到7.7%,农村绝对贫困现象已基本消除。可见,这种模式对于缓解贫困的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它直接有助于穷人,能创造一种更为平等的收入分

配格局；通过广泛的保健、营养和教育服务提高穷人的人力资本质量，无疑这种行动是改善穷人福利和经济前途的有效途径。但是，这只是为穷人获得机会提供了可能性，反贫困的成功还有赖于政府能否为穷人创造提供机会的必然性。

需要满足模式认为消除贫困有两种选择：一是直接向穷人提供保健服务、教育、卫生和供水设施，以及适当的营养；二是可以通过加速经济的增长来提高贫困者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从印度等国的反贫效果来看，前者比后者要显著得多 [阿马蒂亚·森 (Amartya Sen), 2000]。这一点在中国的实践中也得到了证明，仅仅促进经济增长可能使那些预期从增长中得益的穷人得不到好处，只有向穷人提供了保健和教育设施，他们的生产率和收入才能提高；而且，增加穷人的收入而使他们能得到基本的必需品，可能费时甚长，某些设施如供水和卫生设施只能由公共部门提供，在基本必需品缺乏的情况下，只有用统一的方法提供才能使所有的穷人受益。需要满足模式还面临着两种困惑：一方面，提供基本需要将导致资源从投资领域向消费领域转移，结果会阻滞经济的增长，从而又使这种模式难以长期推行；另一方面，提供基本需要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形式，多种教育、健康和其他社会开支都会改善人力资源的质量，它和工业投资一样可以是生产性的，例如举办教育和贫困乡村的保健项目，就会提高穷人的生产率，从而变成减轻贫困程度的手段。所以这种模式可以推行的程度还要受制于它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协调的程度。

发展极模式的反贫行动主要是通过政策支持使生产要素向落后地区集中，大规模的物质资本投资在贫困地区形成新的发展极或增长点，通过发展极的极化和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以缓解区域性的贫困状况。执行这种模式的国家主要是拉美的巴西、墨西哥、智利等。然而，实践中发展极模式也带来了很